

緒論： 組織化資本主義之後

現在還有誰會閱讀馬克思的著作？這十年間，企業融資購併，全球關注臭氧層破裂，尤其是「東歐」共產主義崩解，今日還有哪個學者比馬克思更顯得過時、更像個「化石」？可以肯定的是，一九八〇年代已經為馬克思劃下句點，並將他與眾多曠世鉅著定義成歷史的廢棄物。即使現在我們並非處於歷史的終結，我們可以肯定：這是馬克思歷史的終結。馬克思的理論基礎是針對工業資本主義日益擴大的矛盾提出進一步的分析，而那樣的社會與矛盾顯然都已是過去式。

但是，還有另一位馬克思，此馬克思並非論辯工業資本主義理論的那位學者，而是最早分析「現代性」的思想家。這一位就是我們在《組織化資本主義的終結》中討論的馬克思，這位馬克思在三十歲時就語出驚人地提出此一解析：「隨著現代性的出現，一切有形的事物都將煙消雲散」。更有另一位馬克思，對於分析社會結構的變化功績頗著，在我們進入二十一世紀之時，這些變化似乎也如雨後春筍般陸續出現。這篇分析論述收錄於如今已飽受批評的《資本論》(*Das Kapital*)第二卷。

世紀之交發生的這些變化，在飄渺的時間與空間進程中逐漸顯現。《資本論》第二卷主要闡述「資本流動過程」，同時也

是該書的副標題。若生產只能發生在某個時間、地點，流通便能夠使這樣的生產發生變化：因為，商品漫無目的地流動，且具有流通性，在各個時間流過不同的空間。在《資本論》第二卷的開頭，馬克思主要論述資本的流通，即某形式的資本如何形變成另一種。流通的形式共有三種，包括貨幣資本流通、生產資本流通以及商品資本流通。其中，生產資本還可進一步分為生產工具(固定資本)，以及勞動力(可變資本)。因此，這些流通的過程中共有四種資本：貨幣資本、商品、生產工具和勞動力。他們在空間中流動，並且依照變化中的不同時間性來運作。

當代馬克思主義者採用類似的分析。只是，他們不僅運用馬克思抽象的資本流通模式，並加以具體化而形成獨特的創見解。當代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流通在實質具體的地理和社會空間進行。他們也就時間的觀點具體化地理解馬克思的抽象模式。根據馬克思，或許有人會假定這樣的模式將適用於整個資本主義的歷史。而他所提出的四種資本形式將永遠循環下去，或者在歷史上恆定地持續流通。

相反地，當代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經歷時間而產生的變化，也就是我們接著將會討論的時代劃分(即我們在《組織化資本主義的終結》一書所採用的方式)。首先，十九世紀的「自由」資本主義中，不同型態的資本流通大多只在地方或區域層次上運作，之間少有交叉與重疊。再者，二十世紀進入組織化的資本主義，貨幣、生產工具、消費商品、勞動力明顯地在國家層次上進行流通。進步的社會見證了大型官僚文化企業的出現，這些公司在國內以垂直的方式，或在一些案例中，以水平形式進行整合。另外，產業工會也將其領域「擴展」至全國規模，取代各地原來的職業工會。商品市場、資本市場、甚至是勞動力市場，在整個全國經濟的範圍內顯現出重要性。

第三，伴隨資本主義的「非組織化」，出現了零碎而極具彈性的生產形式，使流通得以出現在國際層次。二十世紀末以品質來看，商品、生產資本以及貨幣的流通，都逐步擴張而漸漸具有國際性，並以全球貿易增加、外商直接投資及全球金融運動的方式呈現。這種情形在一九八〇年代尤其明顯，海外貿易每年成長百分之七，於此同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成員國製造業商品的總產量，每年成長了百分之三。外商直接投資成長更是快速，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八年間，複合年增加率為百分之二十。至於貨幣資本，國際債券交易量由一九八三年的一千五百億美元，增加到一九八三年的四千六百億美元，與此同時，股票市場交易量也從一九七九年的七百三十一億美元，增加到一九八八年的一兆二千一百一十億美元。

這種政治經濟上的轉變可說是「後福特時代」，承繼了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既存脈絡，同時具有後現代的性質。我們之前提到於國際空間流通的三種資本形式：貨幣、生產資本與商品(即所謂的客體)。第四，可變資本，也就是勞動力，則是主體。因此，馬克思所描述的資本流通，同時也是主體與客體的流通，而主體與客體也漸漸令人難以區別。在組織化資本主義轉變為非組織化的過程中，資本主義政治經濟中的各種主客體，其流通的距離越來越遠，尤其伴隨電子網絡的興起與相關功能的拓展，流通的速度也日益增加。

這種客體的加速流通就是「消費資本主義」的要素。隨著流動日益增快，客體以及文化製品變得可以任意配置，用完即丟，並漸漸喪失意義。有些客體，例如電腦、電視、錄放影機、高傳真音響，產製出更多的文化製品或符號(也就是「符徵」(signifiers))，令人無法應付且難以招架。人們受到符徵的疲勞轟炸，漸漸無法辨識符旨(signified)與附著其上的意義。此外，人們受到整個城市中符號的疲勞轟炸，就像齊美爾所描

寫：神經衰弱的漫遊者，即首度出現的「現代主體」，這些現代主體因負荷超載，於是變得冷淡、漠不關心。在此意涵上，由於文化製品日趨豐富且流通速度加快，與其說後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進行批判與基進地否決，倒不如說它是現代主義的徹底誇大。它比現代主義還要現代。也就是說，後現代主義中，循環的增加、流通速度的增快，以及主、客體用完即丟等發展過程都較以往顯著。

近十年來，關於這種後現代經濟、社會的分析主要分成左派與右派的論辯。假若現代主義藉由「耶穌之死」的論述漸次削弱侵蝕西方傳統的根基，那麼，宣稱「人類終結」的後現代主義則又更加削弱殘存的少數基礎。由現代主義所引發的抽象性、無意義性及對傳統與歷史的挑戰，卻在後現代主義的思想推到極致。這些方面，新保守主義分析家和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的看法相當一致。他們的分析不僅出人意外地一致，且其所持有之悲觀判斷也如出一轍。

這種悲觀主義的論述確實有其適切性。但是，本書的其中一項目的，就是說明這些現象仍有解決之道。本書所欲探討的是：在組織化資本主義後，「符號與空間經濟」變得更加普遍，這種現象導致無意義、同質化、抽象化、失序、主體毀壞等現象日益增加。同時，另一系列截然不同的發展也隨之產生。這些發展歷程將開啟許多可能性：工作與休閒被重新賦予意義，社群得以重建，也能夠重新建構徹底變形的主體性，空間與日常生活也更加異質化且複雜。

對於未來的局勢，許多分析家一致提出悲觀的描述，原因之一就是社會發展歷程所依據的觀點，都過於偏向結構主義。這種觀念在政治上的左派、右派都十分普遍，並顯現在結構主義者與後結構主義者的論點裡。本書中，我們將關懷的重點聚焦於「主體性」(subjectivity)的概念，尤其是日趨重要的人類「反

身性」主體，以便致力於匡正此觀念。我們也將探討「反身性現代化」過程中，主體性形成的原因及其帶來的結果。

《組織化資本主義的終結》一書未有此種分析，該書並未充分探究這些經濟空間，或是探討主客體是如何驚人地快速流動，這些流動性本身即具結構性，且具有架構組織的能力。本書後面幾章，我們將檢視各種流動性形成的原因及其造成的結果，包括湧入美國及歐洲尋找工作的移民，以及大量因旅遊與觀光而遷徙的短暫移民。如果我們並未分析這種大規模流通，對整個經濟體、社會結構以及不同社會文化詮釋模式所造成的影響，將難以理解當代社會的情況。此外，本書也將提出在這些遷移模式中已經發生的一些顯著變化，包括後福特主義貧民區以及後福特主義式旅遊的出現。

但是，我們也應該觀察到，不僅是主體本質產生改變，涉及流動性的客體本質上也產生變化。客體的物質內容不斷被掏空，隨之日益增加產生的不是物質客體，而是符號。這些符號分為兩種型態，一種主要是以認知內容為主，是一種後工業化與資訊化產物；一種則以美感內容為主，亦可被稱為後現代化商品。具有真實美感成分的客體快速增加(例如，流行音樂、電影、休閒活動、雜誌、影片等)，便可證明後者的發展，此外，這也表現在物質客體內涵所體現的符號價值或影像等日益重要的元素上。這種物質客體的美學化就發生於此類商品生產、流通與消費的過程中。

一如我們所預見，此種美學化說明在生產中，設計成分成為商品價值中日益重要的要素，而同為生產要素的勞動過程對附加價值的貢獻卻顯得不那麼重要。這種情形甚至在研發或「設計密度」日益頻繁的工業生產也屢見不鮮。基本上，這些增加的研發密度往往相當著重美感，例如表現在服飾、鞋子、傢俱、汽車設計、電子商品等產品的美感。而耐久消費財的特

色在於：它是一種建構的「微觀環境」，可以是大樓、房間、衣服、汽車、辦公室等等。

因此，我們希望能夠探討出現在組織化資本主義之後的「符號與空間經濟」。就此意義而言，當代的全球秩序以及失序就是一種流動的組織架構，是一種符號經濟去中心化之後在空間的集合。但是，更多證據顯示，其它迥然不同的發展也隨著這些不對稱網絡的流動而出現，並與之抗衡。證據指出，日益受制於此種空間經濟的同一群個體、同一群人以及空間經濟的主體，逐漸變得更加關注自身的反身性。除了沉默的多數、電視迷，以及布希亞談論之符號多樣化而造成的「黑洞」，仍有許多人逐漸採取批判與反身性的觀點，來看待此種嶄新的資訊社會制度。

文化素養日益普遍，在這種新秩序中，對於「專家系統」的信任也傾向崩解。如此一來，便使得此種批判反身性獲得發展的空間。現代化晚期的個人化發展中，這種不斷茁壯的反身性即為相當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去傳統化的發展正持續進行，使得社會行為個體(agent)逐漸能夠跳脫他律的控制或社會結構的監督，而進行自我監督與自我反思。這種逐漸累積的個人化發展，便是一種跳脫結構限制的過程，也是一種現代化的結構轉變。換言之，過去存在於社會結構的力量，如今已轉移到個體身上，而這種轉變過程就是主要的驅動力。舉例來說，經濟的結構變化，使得個體從福特主義勞動過程的僵固結構中解放出來。亦即勞動力逐漸變得更具自我監控的能力，並對於工作場所的規則與資源提出更多的反思，這些都成為經濟結構變遷以及資本積累的先決條件。因此，我們將深入探討經濟生活中反身性積累(reflexive accumulation)的發展歷程。

因此，本書不僅探討流動的全球社會學，也包括移民、旅遊、傳播、影像、金錢、資訊與時間的流動。本書進而討論國

內以及在地性的反思社會學。近年來，多數有關反身性的文獻幾乎完全以認知(cognitive)的概念來瞭解此一現象，而佐證的文獻大多來自科學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ce)。根據科學社會學，反身性意指將理論假設運用至理論本身，或者更廣泛地意指某個專家體系的自我監控，根據其假設來回應理論本身的問題。較不受建構論信念影響的科學社會學家，將這項概念予以延伸，涵蓋科學社群的自我反身性。個人化的發展趨勢使得公共反身性的議題轉移到質疑科學以及專家體系上。近年來，社會學理論更普遍運用「反身性」此仍屬認知性的概念，藉此討論社會個體何以能夠控制、組織自己的個人生活型態，社會本身如何藉由社會科學而更具備自我建構的能力。本章將接著關注反身性的認知面向。與其它研究分析不同的是，我們特別將焦點聚集在經濟生活上，著重於某些「反身性產製」以及「反身性消費」的細微現象。

與上述現象同時並進的還包括現代社會晚期的一項重要發展，這並不屬於認知面向，而是美學反身性(aesthetic reflexivity)的持續發展。認知反身性源自理性主義以及現代啟蒙運動傳統中，笛卡兒思想的假設論點，而反身性的其它面向則來自美學現代主義的假設與實踐。此面向的現代性討論並非源自笛卡兒與盧梭，而是波特萊爾(Baudelaire)與韓波(Rimbaud)。若認知反身性談論的是「監控」自我，以及監控社會結構的角色與資源，那麼，美學反身性則探討自我詮釋，以及對於社會背景實踐的詮釋。如果說認知反身性以評判標準為前提假設，美學反身性則是以詮釋學為取徑，與迦達默(Gadamer)相同，以先前判斷(pre-judgment)為基礎。若認知反身性假設自我與社會世界存在主體 / 客體關係，美學與詮釋反身性則假設自我同時代表人存在於這個世界之中(being-in-the-world)。

在日常生活領域中，我們便可發覺許多有關美學反身性的

例證。在許多經濟面向上，經濟逐漸以「設計密集的生產」(design-intensive production)為核心。如果說，知識密集的貨品與服務生產(knowledge-intensive production)是以服務的效用為主，設計密集的生產則是以貨品與服務的「情感性元素」(expressive component)為主，這項重要元素涵蓋從文化產業的貨品到空服員的「情緒管理」(managed heart)。同樣地，消費者實踐也將以美學反身性作為基礎，例如，觀光客將會建構、解構「空間的神話與想像」。美學反身性鑲嵌在時間的現代性概念，它是一種廣泛拒絕真實時間與功利性估算暫時性組織的概念。美學或詮釋反身性則基於一種背景假設，意即在一種不甚明確的實踐之中(如次文化、想像社群與虛構社群)，新的社群例行性地創造出意義。生態運動或者二十世紀晚期的社會運動即為此例。因此，美學與認知反身性將構成本書的主幹。

《符號與空間的經濟分析》一書以時間診斷(zeitdiagnostische soziologie)的社會學實證概念為根基，試圖同時探討流動社會學以及反身性社會學。如上述討論，本質上，流動與反身性可視為矛盾卻又能相互中和的現象。但是，這並非唯一的可能性。反身性現象以個人化論點為預設立場，這項觀點於一九八〇年代晚期與一九九〇年代早期的西方社會理論中被提出。在美國，理性選擇論相當盛行；歐洲則廣受反身性現代化或反身現代性理論的影響與衝擊；在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曾提出一項頗具爭議的論點：社會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強大權力的國族國家情境下，具有企業家潛能的個體。在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關於社會內爆分化的論述中，也包括這樣的個人化概念。

我們同意此論點：在相對之下較具實證依據的概念上，比起過去，既存的社會結構逐漸無法監控具有自主性的行為主體。但是，我們並不認為這代表結構解釋取徑已不具任何價

值。我們認為，相對而言，如今確實形成以反身性個體為出發點的結構基礎。這並不屬於社會結構，而是逐漸蔓延、普遍化的資訊與傳播結構。我們也認為有一項發展趨勢：社會結構、國家顯然逐漸被全球資訊與傳播(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C)結構所取代。資訊與傳播結構代表的就是網絡流動，也是符號與空間的流動，而這些都是本書所欲探討的主要論題。因此，結構性的流動與資訊積累都是認知反身性的根基。結構性流動、影像與表意符號的積累，都是不斷發展之美學反身性的先決條件。因此，認知反身性與美學反身性共同構成符號在空間中的經濟。

也就是說，本書主要可分為四個部份。第一部份主要討論本書的兩項結構原則：流動網絡與反身性現象。第二章將探討傳播地理學家描繪資訊、傳播、金錢與投資資本流動經濟的文獻著作。此現象發展的一項重要結果為：不對稱的流動網絡；全球性城市則是制度化管制這些流動的核心。這些文獻也討論物質與後物質跨越更遠距離、流動更快速的形態。這種「加速」、「延展」的現象造成一項結果：內容逐漸空洞，過去既存的主體與客體意涵、主客體運作的時空連鎖關係也逐漸消逝。

第三章將深入討論反身性之相對抗衡原則的發展。貝克(Ulrich Beck)以及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著作，詳盡探討了危機、專家體系、個人化等議題。在第三章裡，我們將針對貝克的論點提出批判：包括社會化不足、該論點在研究方法上所隱含的個人主義，以及認為社會是「學習過程」的輝格式(Whiggish)預設立場。我們也針對紀登斯論述的主要假設提出批判，紀登斯的「本體不安全感」(ontological insecurity)論點，導致他完全以工具理性的觀點來瞭解人類行為，這與涂爾幹對於專家體系角色的理解相當類似，而此論點，過去卻未曾受到批評。為避免貝克與紀登斯的認知偏見，我們試圖藉由牟斯

(Marcel Mauss)與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對於分類與習癖等概念的具影響力認知前理解，以及泰勒(Charles Taylor)關於現代自我的美學與譬喻來源之論點，進而發展反身性的美學面向。

第二部份從第四章開始，主要討論反身性的結構情境。我們分析日本、德國與先進部門(英美)產製體系的「反身性積累」(reflexive accumulation)。在此，我們從「資訊結構」國家開始討論，此概念由日本社會科學家提出，也就是既存產製體系內資訊的流動與知識取得情境。據此情境脈絡，我們也將反身性積累的三項模式與這些個案連結起來。美國、英國等情境下，資訊結構促進了反身性消費，而德國與日本對於資訊結構採取統合主義(corporatist)與前現代式的制度化控管，也使得這些國家形成高度的現代反身性產製。

第五章將運用這些原則更深入地討論關於文化產業(culture industries)的研究，主要著重於探討電影、電視、錄音、出版、廣告產業的垂直分工發展現象，在此情境下，美學反身性也在影像消費與產製內逐漸發展。如今，文化產製品主要由文化產業以外的各企業公司所產製，而文化產業則是以此類產品的資金與行銷為主。也就是說，文化產業並非商業化或是一種行業，而更像一種商業服務。文化與經濟有效地「去分殊化」(de-differentiation)，廣告產業就是一種商業服務，投入產製美學藝術品的工作，而文化相關產業成為一種商業服務。

如果第四章與第五章討論的是反身性現代中，社會前三分之二的「勝利者」，那麼第六、第七章便著重於「輸家」的情勢，也就是西方世界中的少數族群與移民。第六章針對今日所謂的「下層階級」提出社會空間的分析，這些下層階級居住在經濟、社會與文化規範皆相當不足的地區。在這類地區，傳統的組織化資本主義社會結構都已瓦解或被移除：包括工業勞動市場、教會、家庭網絡、社會福利機構、工會等。這類地區與

城市中心、近郊住宅區完全不同，它們尚未被取代以資訊與傳播結構作。管制與規範的缺乏造成社會去組織化，因而形成今日的美國黑人貧民區。但是，這種論點同樣可運用在英國住宅區，也可解釋部份東德青年的種族主義，在此，「福特主義」與社區主義／國家主義的社會結構都已消逝，然而資訊傳播結構卻尚未發展。第七章將探討類似情境下，後組織化資本主義的移民群。尤其，我們主要將以德國作為討論個案。在此，我們已知道，統合主義制度是產製資訊與傳播結構的先決條件(第四章)，在發展的同時，某些少數民族、女性卻被排除在產製資訊與傳播結構的近用權之外，甚至也被排除在市民社會以外。

第三部份，本書將回過頭來針對空間與時間經濟進行反思。第八章特別關注後工業主義，以及各類服務重要性的提升、逐漸更以設計密集生產為導向的起因與後果。我們將討論此類服務的工作本質為何，包括其所注重的反身性元素；私人與公共領域的重構模式具有哪些特色；這類服務的成長對於空間所造成的影響。在此，根據愛斯平安德生(Esping-Andersen)的分析架構，後工業的空間具有三種不同的軌跡。整體而言，在今日的符號與空間經濟中，消費服務比起過去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這類服務承載大量符號，而不僅止於資訊。人、空間與社會群體，都能藉由此類服務的無止境流動而產生轉變。

相對而言，第九章則主要關注時間的本質。本章將針對時間社會學等既有取徑提出批判，藉此顯現出：如今已有許多不同「時間」的存在；時鐘時間被視為自然時間的標示，事實上此由人類所建構；若我們不再以牛頓或笛卡兒的方式來看待自然時間，那麼自然與社會時間便會具有許多相似之處。本章也特別著重證明社會時間如何產生轉變，以在組織化資本主義與時鐘時間為主流的情勢，如今都已遭到取代：時間逐漸成為一

種即時漫長或漸進的時間。在此，我們也將深入討論這些時間型態與反身性的關聯。去組織化資本主義促成一種相當直接的時間與記憶型態。

第九章所討論的其中一個面向是：跨越時間(當然包括空間)的重要性也逐漸提升，我們將在第三部份特別討論此議題。接著，我們將轉向另一項有關全球性規模流動的研究。第十章以旅遊為主要論題，一開始我們便提出：現代世界的一項構成特質就是大眾旅遊。而我們必須根據風險類型來進行分析討論。研究也顯示，流動改變了人們的身分。我們也將討論關於實體與社會環境反身性的成長，而此結果又如何有助於世界主義的成形，「規範者」逐漸被所謂「詮釋者」而取代。更廣泛而言，我們認為與去組織化資本主義相對應的現象，是「旅遊」與當代社會世界裡其它社會實踐之間的去差異化。此分析以旅遊相關的各種交換為主，特別是有關「視覺資產」的金融交換以及可能的日常生活美學化現象。

第十一章將以社會生活的三個不同面向：貨幣金融、自然與環境，以及全球文化與民族性，來思考全球化議題。各個面向都能夠顯示全球與在地發展歷程正在形構之中。的確，全球發展的前提為某些在地性的形構，我們將以全球金融網絡的成長為案例來詳細討論。在環境面向，我們也證明自然的反身性，亦為自然與人類活動的關係帶來重大衝擊。我們也將探討，此類訴求全球思考、在地實踐的反思亦具一些矛盾之處。「全球文化」的爭論並引發一些有關全球的論述。在此我們發現，此類文化型態並未消滅民族或在地差異性，而是重新重視此類認同。

本章與最後一章的一項重要論題在於思考：資訊與傳播流動下，市民身分的轉變。這為傳統上著重於單一國族國家的市民概念帶來何種影響？事實上，我們也藉由流動與反思社會學

的分析，提出可能隱含的其他情境。另一方面，樂觀的後工業主義與去中心化資訊社會，完全是抽離組織化資本主義「傳統」的「新社會」；另一方面，被流動資訊與傳播結構所拋棄的反烏托邦論述也成為荒蕪之地，流動的旅客快速經過充斥著豐富符號象徵的各個區域。無論何者較具可能性，上述兩者皆可能並駕齊驅。本書致力於重新建構此類關於另類未來發展爭論的範疇與理論。

《組織化資本主義的終結》認為，當代社會已去組織化而非重新組織，此書並因此遭受批判。在本書中，我們希望能更具說服力地證明：當代資本主義確實已去組織化。因此，我們認為，在國家疆界內，主體與客體的流動不再具有一致性。雖然某些強力的組織仍影響著國家，但這些模式卻不需具備一致性。的確，不同組織會在不同時間上運作。例如電腦的即時時間、全球電子傳播的預設形式，或者環境變遷的冰河時間(glacial time)，人們被鼓勵思考自身行為對於整個世代、全體人類與其它動植物種的影響。因此，個人社會是系統化去同步性的主體，由此全球形成一個整體。今日的世界就是一個「風險社會」，人類造成全球問題，卻也逐漸反思並控制這些後果，並針對問題發展部份的解決方案。因此，個人化發展是風險社會的主要根基，制度與許多重要組織逐漸式微。當代生活則以反身性的社會組織為基礎，但是，反身性是否能被組織化、將風險程度降至最低？這仍然存在疑問。

本書之中的許多論題並未非常詳盡地予以討論，部分原因在於：即使是一部長篇大作，也無法包山包海；另一部分原因在於，這類議題可算是有些陳腐。尤其是本書略而不談的父權理論、東歐各國的革命、歐洲聯盟的發展、環太平洋地區勢力(除日本之外)的崛起、國家型態的發展、科學與科技的本質、北大西洋地區以外(同樣除日本外)各種發展歷程所造成的影

響。本書討論的是核心，也就是新世界秩序下的強權、新全球性城市、遷徙出入這些核心區域的移民，以及適用於探討這些核心的理論見解與實證資料。

但是，這樣的中心並未在掌控之中。去組織化資本主義使得所有事物被去組織化。沒有事物是固定、既有或確定的，任何事物都必須仰賴更廣泛的知識與資訊，以及制度化的反身性。人們逐漸瞭解自己擁有的知識是如此渺小。失控的符號與空間經濟不可思議地增加，資訊型態、知識與美學評判亦不斷發展。這是反身性所帶來的非預期結果，也就是說，反身性個體對於逐漸不固定之結構所造成的影響，通常會引發更深層的去組織化。

網路試閱版聲明

1. 敝社目前對書籍翻譯品質管控日益嚴謹，每本書都至少經過四校的把關程序，此試閱版已正式上市版本有某種程度的差異。
2. 讀者閱讀此試閱版本如果發現錯譯或不妥之處，歡迎讀者儘速透過電子郵件 (Email: weber98@ms45.hinet.net) 向敝社反映，以便在此書有正式上市時能即時修正。
3. 如果讀者試閱此版本以後，對本書的內容有興趣，期盼各位讀者在本書正式上市後，踴躍購買。您的選購就是對本社最具體的支持，也得以讓敝社更加茁壯，出更多好書。

版權所有，請勿做具商業屬性的運用